

曾侯與编钟“君庇淮夷说”献疑*

鄢国盛

内容提要 周初淮夷居于淮河中下游，与曾国所在的随州相距较远，曾国势力无法及于淮夷而实施有效统治。曾侯與编钟称曾国始封君南公“君庇淮夷”，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西周早期分封曾国的目的是经营江汉，扼制荆楚，与淮夷无关。春秋时期，淮河中上游有淮夷，与鄂北的曾国邻近，此时人们将山东以及江淮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族统称为东夷，追述周初历史又以淮夷为东夷集团的主体，淮夷为患时代遂被提前到周初，周初淮河上游有淮夷也就成为共识，“君庇淮夷”这一有悖史实的说法遂具备了合理性。

关键词 周代地理 曾侯與编钟 淮夷

湖北随州文峰塔一号墓出土的曾侯與编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铭文甫一公布，即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纷纷撰文就文字释读、曾国始封、叶家山曾国墓地族属以及曾随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除学界关注的上述议题之外，铭文“君庇淮夷”一语所涉淮夷之患的相关问题，也十分值得深入研究。为讨论方便，先将相关铭文以宽式文字写录如下^{〔1〕}：

伯适上庸（？），左右文武，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根据学者研究，南公名适，辅佐文王、武王伐灭殷商，于成王时受封于江汉地区，但他本人留任王畿不就封，而由其子代为赴命建立了曾国^{〔2〕}。值得注意的是，铭文提到曾国的一项使命是“君庇淮夷”，不少学者由此认为周初分封曾国于南土的目的在于防范淮夷，但是周初淮夷分布区域与汉东地区相距较远，曾国无法对淮夷实施有效的控制。董珊先生认为，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提到的西阳，位于淮河上游，更为接近淮夷，应是曾国最初封地^{〔3〕}。于薇女士指出，淮夷大约在昭穆时期才向淮河以西扩张，铭文其实是春秋时人根据当时情况撰写，并不反映西周史实^{〔4〕}。两位学者的观点皆极富创见与启发性，惜未展开深入讨论。淮夷在西周历史上十分活跃，对周王朝的兴衰产生过重大影响。“君庇淮夷说”存在的疑点如不澄清，势必影响我们对周代淮夷分布、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等问题的认识，因此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代黄淮地区夷夏政治地理格局研究”的经费资助(项目编号：18FZS009)。

〔1〕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2〕 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3〕 董珊：《随州文峰塔M1出土三种曾侯與编钟铭文考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年10月4日。

〔4〕 于薇：《“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专家座谈会纪要》，《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一 曾侯與编钟“君庇淮夷说”不可信据

考古发现业已证实西周早期的曾国位于湖北随州叶家山，而同时期的淮夷考古学文化集中在安徽江淮地区^{〔1〕}，两者地域远隔，没有直接联系，随州的曾国不可能遥控江淮地区的淮夷。曾国领土始终以随州为中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国势最为强盛，楚人曾说“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随即曾^{〔2〕}，其领土包括了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和涇水中上游三个区域^{〔3〕}，但也没有超出湖北北部一带。曾国“君庇淮夷”的情形大约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但是湖北一带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典型淮夷文化遗存，而与之相邻的河南信阳地区却有几处内涵比较丰富的淮夷文化遗存考古发现。由此可以断定淮夷是由淮河中下游溯流而上进入信阳地区。考察这一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演变，对于我们判断淮夷西进时间将有一定帮助。

信阳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是一处重要的商周文化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商周墓葬60余座^{〔4〕}，其商文化层属于殷墟文化二期至四期，相当于武丁至帝辛时期，出土了大量的“息”字铭文铜器，证实这一地区是晚商息族领地。属于息族的铜器在殷墟也有发现^{〔5〕}。武丁时期商王室的甲骨文材料，如宾组刻辞“戊申，妇息示二屯”（《合集》2354白），以及子卜辞“乙亥卜，奏息伯引”（《合集》20086），其中妇息是息族嫁与商王室的贵妇，息伯则是息族首领。息作为地方贵族与商王室有姻亲之谊，与商王室关系十分密切，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应当是驻守在南土颇受王室倚重的一支贵族。罗山遗址叠压在商代墓葬之上的是战国墓葬，表明商王朝灭亡，息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也随之结束。但息并未灭亡，据相关铜器可知息入周之后仍存续了一段时间，如徵簋“公史（使）徵事（使）有息，用作父乙宝尊彝”（《集成》3862），记载徵受公命出使息国。此器纹饰、字体皆具西周早期特征，其时代约在成康时期。再如时代相当或稍晚的息伯卣与息隰仲盘，铭文分别为“唯王八月，息伯赐贝于姜，用作父乙宝尊彝”（息伯卣，《集成》5385），“息隰仲仆作父辛宝尊彝”（息隰仲盘，《集成》10083）。两器分别为息伯与息国公室贵族所作，铭文称述父考皆用日名，透露出器主为商遗，应就是罗山商息的后裔。卣铭中赐贝予息伯的姜姓女子一般认为即王姜，是康王或昭王之王后，其时代应当不晚于昭王时期^{〔6〕}。由此可见，商王朝灭亡后，息人归顺了周王朝并受到礼遇，至康昭

〔1〕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页115—1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3〕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页332—337，文物出版社，2009年。

〔4〕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1991年河南罗山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5〕 己父息觚（《新收》240）。

〔6〕 徐少华：《息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分析》，《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

时期仍与王室有密切往来。关于入周之后息族迁徙之地，有学者认为在河南息县，相关材料不足，仍有待今后研究。

信阳地区也发现有西周早期的中原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狮河港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考古工作者推测它们很有可能出自早年被洪水冲垮的周代墓葬^①。这些铜器铸有“𠄎册”、“冉”、“疾”、“𠄎”等族氏铭文，表明其所有者身份属于商遗民，其中“𠄎册”铜器有五件之多，应是墓主家族自作之器。属于该族的铜器目前仅见于狮河港一处，其家族是商代即已定居于此还是周初迁徙而来，已无从判断。但整理这批材料的学者指出，这批铜器中个别器物纹饰、型制与昭王时期的折觥、折卣多有相似之处^②，由此可推断其年代下限大约在昭王时期，该族退出这一地区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昭穆之际。

除上述两处中原文化遗存外，信阳孙砦也发现了一处堆积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其周代文化层分布面积较大，出土陶器不仅数量丰富且完整器较多，器形具有明显的淮式风格特征，最为典型的有折肩鬲、折肩罐、鼓腹罐、带把甗形盃、钵、三钮盖等。但遗憾的是，由于遗址地层关系不甚明确，发掘者初步推测其周代文化层时代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③。这一分期跨度较大，不够精确。孙砦遗址位于信阳市区北20公里，已经深入到淮河上游北端，接近中原腹地，如果这支淮夷在西周早期就定居于此，必然与周王朝地方诸侯或贵族势力形成共存的局面，但西周中期以后淮夷与周王朝时常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战乱频繁的情况下，这支夷人能够安稳地发展到西周晚期，是难以想象的。近年，随着安徽江淮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霍邱堰台遗址的发掘整理，为淮式陶器分期建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④。孙砦遗址中年代较早的陶器与堰台遗址二期(西周中期偏晚至晚期偏早阶段)出土陶器几乎完全相同。此外，信阳其他地方如三里店^⑤、固始平寨^⑥也有淮式陶器的零星发现，通过对比，可断定其年代也不早于堰台二期。因此学者推断西周中期至春秋前期淮河上游与淮河中下游文化面貌一致，属于同一文化区^⑦。此说可信。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大约在昭穆之际中原势力开始退出淮河上游地区，淮夷占据这一地区则是在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此后曾国才有可能通过桐柏山、大别山间拗口及汉水支流等通道与淮夷发生联系。但据铜器铭文反映，淮夷几次内侵的势头比较猛烈，与周人在淮河上游的争斗一度处于胶着状态，在这期间并无材料记载曾国参与对淮夷的作战。曾国对淮夷的控制，大约要到宣王平息淮夷之患以后才有可能实现。钟铭说曾国于周初受封之始就能“君庇淮夷”，明显与史实不符。另外，从地理位置看，曾国所在的随州位于随枣走廊东端，北面的桐柏山与东面的大别山形成天然的屏障，不利于曾国向淮河流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县文管会：《河南信阳县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第1期。

② 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县文管会：《河南信阳县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第1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页377—379，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⑤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⑥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⑦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页398，科学出版社，2010年。

域拓展。西周早期周王朝应是依靠册等殷遗控制淮河上游，不需要曾国直接插手。分封曾国的目的当是经营江汉。

周代生活于江汉地区的民族主要是荆楚。《左传》昭公十二年楚人追忆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林，以事天子。”据《史记·楚世家》，熊绎相当于成王时期，可知当时楚人已居荆山。近年学者根据清华简《楚居》的内容，研究指出西周楚人活动的核心地区在鄂西荆山、宜城一带^①。周王朝在江汉地区分封的诸侯则主要分布于鄂北的襄阳至随州一线，有邓、唐、厉、鄂、曾诸国。安州六器的中甗（《集成》949）、中觶（《集成》6514）记载昭王末年南巡，即循此途在鄂北行进。鄂北诸国又以随州的曾、鄂尤为重要^②。与昭王南巡有关的静方鼎（《新收》1795）记载王命中与静巡省南国相，设立行宫，命静司掌在曾、鄂两地之王师。李学勤先生指出，相是湖南湘水流域相侯之国^③。可见曾、鄂是周人经营江汉、南下长江中游的军事基地。不唯如此，曾、鄂应当也是伐楚的军事重镇。李学勤先生据近年公布的胡应姬鼎铭“唯召王伐楚荆，𡵓（胡）应姬见于王”之内容，指出昭王南征途经河南漯河以东的胡国^④，这对于我们探讨昭王南征的路线很有价值。谿簋（《集成》3950）铭文记载昭王南征起点为成周。成周（洛阳）——胡（漯河）这条路线明显偏东，顺此南下正好通过“义阳三关”到达随州的曾、鄂。由此推测，昭王先到曾、鄂，统帅两地王师，然后西行经随枣走廊至荆山伐楚。

综上所述，鄂北的封建不仅为周人南下长江中游开辟了一条通道，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随枣走廊与襄宜平原，将楚扼制在鄂西。鄂北诸国中曾、鄂两地的王师，在昭王伐楚活动中应当起到关键作用。曾国作为姬姓诸侯，其地位当更为突出。因此周王朝分封曾国的目的是以之为根据地，经营江汉，扼控荆楚，向东进入淮河流域并不是主要目的，与当时尚处于淮河中下游的淮夷更是毫不相干。曾侯與编钟所谓“君庇淮夷说”不可信据。

二 “君庇淮夷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君庇淮夷说”与史实不符。周初分封曾国的真实目的是经营江汉，扼控荆楚，根据实际情况，钟铭写作“君庇荆楚”似更为贴切，但为何将荆楚代之以淮夷，这一问题也需要解释清楚。

曾侯與编钟制作于春秋晚期，上距周初已有数百年的时间，经过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曾人是否对其建国之初的历史有所淡忘，只能根据春秋当时情况来补写历史？实际原因恐怕并不如此简单。了解西周封建的学者对《左传》定公四年卫人子鱼所述周初分封鲁、卫、晋三国的内容应当非常熟悉。这段材料说

①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西周早期的鄂国已被考古发现确认在随州安居，参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 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通向文明之路》页175—179，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④ 李学勤：《胡应姬鼎试释》，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明直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重要诸侯国仍完好地保存着本国早期历史档案，其始封情况亦为他国所知。曾国虽处江汉，与中原各国交往不便，他国对其历史或许不甚了解，但它本国应与中原各国一样，也保存有自己的史册，对建国之初的情况不会不清楚。再者，昭王经略南土一系列活动，曾国作为前线大本营，接纳王师驻扎，供应给养，是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对于曾国来说，这是继先祖南公“左右文武，挾殷之命”的又一件值得标榜史册的功绩。曾人对此应当有着深刻的记忆。伐楚又被后世视为昭王不可磨灭的武功广为流传，如恭王时期的墙盘（《集成》10175）说：“弘鲁昭王，广惩楚荆，唯免南行。”宣王时逯盘（《新收》757）云：“丕朕高祖惠仲盩父，盩和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①直到春秋时期，齐桓公伐楚还以“昭王南征而不复”兴师问罪。经营江汉是周王朝建立之初的既定方针。曾国参与其事，无论是自身的荣誉感还是后世对此事的广泛传颂，都在无形中强化着曾人对其封建之初所肩负使命的历史记忆。因此，钟铭不言“君庇荆楚”，不能简单地以曾人对自身历史的遗忘来解释。

春秋时期曾楚关系应当是曾国史官无法秉笔直书的主要原因。曾是有着王室血统的姬姓诸侯，出身显赫，文峰塔1号墓出土的B组编钟铭文曾侯與自称“稷之玄孙”即是明证^②。而楚原本是被拒斥于周人盟会之外，置茅蕪、设望表，与鲜卑守燎的蛮夷^③。两者地位、身份相差悬殊。但进入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力政，楚由蛮夷发展成与晋匹敌的头等强国，江淮间诸国大多为其所吞并，中原诸侯也多依附于楚。曾国势单力孤，几次交手都不敌于楚，直到鲁僖公二十年最后一次叛楚失败，再无兵戎相见的记载。此后，曾国这个昔日抚有江夏、屏藩周邦的王族贵胄，彻底沦为追随楚人的附庸。

吴楚柏举之役中，曾人的立场和心态充分反映了曾对宗主国楚的敬畏。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此役楚师大败，昭王奔随（即曾），吴师兵临城下，逼迫随国交出楚王，随人拒绝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迹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言辞之间透露出随以小事大的谨慎小心，以不被强邻灭亡而感恩戴德，因此断不敢交出楚王，引祸上身。亦如清人魏禧的分析：“随受楚兵数矣，出王与吴未为不义，然楚可败而不可灭，复立君，而随之亡不旋踵矣。仓促遇此大事，最须远见。”^④审时度势，随终究不敢背叛楚，可见对楚十分畏惧。曾侯與编钟也记载了这次战争，证明铜器铭文中的曾就是文献中的随，其制作时间当在此役之后不久。此时形势与周初已是天壤之别，曾人也就不敢再公开地以征服者姿态提起周初经营江汉、讨伐荆楚那段引起楚人不快的往事。但是周代诸侯作诗或撰文，又颇好以攘夷之功自矜，如春秋时晋公益“我皇祖唐公，应受大命，左右武王，和鬯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王命唐公，成（定）宅京师，□□晋邦”（《集成》10342），措辞与曾侯與编钟十分相似，所云“和鬯百蛮”即安抚百蛮之义。

① “扑伐楚荆”应当专指昭王而言，“盗政四方”与穆王周行天下颇为契合。虽然铭文将两事混言并举，实则分属两王。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③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页430，中华书局，2002年。

④ 魏禧：《左传经世钞》卷二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经部春秋类，第120册，页695，2002年。

再如称颂韩侯受命的《诗·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赐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除百蛮之外还提到貊，这些北方的民族都被视为韩侯的臣属。更为夸张的则有颂扬鲁僖公的《诗·鲁颂·閟宫》，说鲁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鲁侯之武功可谓四夷皆服。在这种夸饰攘夷之功盛行的风气中，曾人也不免受其影响，既不能提伐楚之事得罪楚人，又要仿效流行的文风赞颂先祖，根据春秋时期的情况，可以取代荆楚镂诸彝铭的就只有淮夷了。前文列举考古材料已经说明两周之际淮夷的一部分族群迁居至淮河上游信阳地区，与曾国为邻。此外，春秋早期的曾伯霁簠（《集成》4631）铭文还有“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之语，是说曾伯驱逐淮夷，平定繁汤之地，使得输送金锡之路畅通。繁汤亦见于晋姜鼎（《集成》2826），即《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繁阳，在今河南新蔡以北三十里，是东周时期著名的铜锡产地或集散地。由曾国北上取道大别山间的“义阳三关”，或绕经南阳盆地进入淮河上游，东行穿过淮夷分布区，就可以到达汝水之滨的繁阳。铭文“金道锡行”，就是穿过淮河上游的淮夷分布区的一条通道，亦属曾伯“克狄淮夷”之地。曾伯霁簠印证了“君庇淮夷”是春秋时期曾国对迁居淮河上游淮夷族群的征服，西周早期并无此事。

“君庇淮夷”虽是春秋之事，与西周历史不符，但东周以来人们所说的东夷、淮夷较西周时期发生了变化，使得“君庇淮夷”这一有悖于史实的说法变得顺理成章。原本在西周时期，东夷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夷人，淮夷则是淮河流域的夷人，因它在南土，亦称南淮夷或南夷。东夷、淮夷两者分布地域有别，为患时间也有早晚之不同，穆世以前是东夷为患，穆世以后才主要是淮夷为患^①。但东周以来东夷概念发生扩大和泛化，与此同时淮夷概念却在缩小，专指一个具体的民族，又因为淮夷分布于东夷区域之中，淮夷遂被纳入到东夷集团中，与西周时期东夷、淮夷泾渭分明，互不统属的情况大不相同。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淮夷，《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诸侯因淮夷病杞而会于咸，当时杞国政治中心在山东新泰^②，能够侵扰杞国的淮夷应当在其附近。又《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晋卿范献子评论鲁国内政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季氏能得到淮夷的支持，也说明淮夷与鲁邻近，杜注“淮夷，鲁东夷”。以山东地理而言，鲁国在山东南部，其周边地区皆称鲁南。这一地区的淮夷有可能是两周之际，王室多故、四夷交侵的背景下，由淮河流域迁徙而来。除鲁南之外，还有一部分淮夷居于淮河中上游。《春秋》昭公四年记载：“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追随楚人伐吴的这些国家多在淮河中上游，淮夷当亦不例外。孔颖达曾指出病杞之淮夷在东国，召穆公所伐之淮夷在淮南，淮之南北皆有淮夷^③。王应麟亦认为，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之则在淮北，扬州有之则在淮南^④。胡渭亦取此说^⑤。可

① 张懋镕：《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人文杂志》1990年第4期；何景成：《应侯视工青铜器研究》，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页22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钱益汇：《杞国都城迁徙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疏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八《大雅·江汉》，《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影印本，页685，2007年。

④ 王应麟撰，王京州、江合友点校：《诗考；诗地理考》页308—309，中华书局，2011年。

⑤ 胡渭撰，邹逸麟点校：《禹贡锥指》页133—1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见淮夷散居鲁南与淮河中上游，不止一种。而据前引《春秋》昭公四年淮夷参与盟会征伐的内容，亦可知它是一个具体的民族，与西周时期淮夷泛指淮河流域夷人诸邦相比，范围明显缩小。春秋时期淮夷大概如同狄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一样，虽然居地不同，但风俗习惯差别不大，仍属于同一民族。

与淮夷概念不同，东夷概念变得十分宽泛。《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评论成公十八年彭城之役说：“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宋国的彭城曾被楚人占据，不久又被晋夺下归还给宋，楚因而失去了对东夷的控制。彭城在今苏北徐州，占据此邑即能控制东夷，说明苏北地区有东夷。《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邾、鄫之属的鲁南小国，与宋国东方的彭城邻近，因此宋有号令这些东夷国族的地利。合观两条传文，宋公欲属之东夷与楚所失之东夷所指为一，当分布在鲁南苏北一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杞所即之东夷应当也在上述区域。除邾、鄫以外，春秋时期鲁南比较活跃的莒国、郯国在当时也被视为东夷。鲁南苏北自西周以来就是东夷分布区，春秋时期东夷涵盖族群范围又远远超出了这一区域。根据《左传》记载，江淮吴楚之间的诸小国也是东夷。如《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六在今安徽六安，它所亲近的东夷当与之相距不远，都在安徽江淮地区。文公九年“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在河南淮阳，楚公子朱据杜注是楚息县公子朱。楚息县在今河南信阳息县，地处淮河上游。公子朱“自东夷伐陈”应是由息县顺淮而下，至淮河中游的安徽江淮地区北上伐陈，其间假道东夷。假如是从鲁南苏北的东夷之地伐陈，则需要向西假道于宋，不能直接到达陈。因此这里所说的东夷还是在安徽江淮地区。此外，《春秋》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同年《左传》记此事云：“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合观两条材料，传文所说的东夷当即经文之徐、越两国，由此看来江淮下游的国族也是东夷。

春秋时期的东夷范围明显扩大，北及鲁南、南至江淮这一广阔区域中发展相对落后，或具有蛮夷血统的国族都属东夷，淮夷只是散居其间的一个民族，笼统地说淮夷也是东夷。原本与东夷互不统属的淮夷，随着东夷概念的扩大，被纳入东夷集团之中，二者之间的族群界限随之消失。又由于春秋时期许多夷人国族浸染华夏文明而不同程度更化，尽管中原诸侯有时仍以固有的文化优越者的心态斥之为夷，但这些小国追随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其实已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或附庸，如邾、莒、郯、江、黄等皆属此类，而淮夷之族自西周中期以来即与周王朝为敌，强大难制，给周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春秋时期淮夷仍有一部分未服王化，因此它们很容易被认作东夷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周秦之际人们谈论西周早期东夷历史的时候，就常常将淮夷视为东夷的主体。《史记》记载周初东征的历史，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周本纪》载：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黜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鲁周公世家》载：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

不难发现，上揭《史记》文字实际是在介绍《尚书》诸篇创作背景，与一般的叙史内容不同。因为司马迁在撰写周初历史的时候，由于材料不足，大量参考了《书序》，以此权且弥补周初史料之不足。关于《书序》的时代，朱熹曾认为是“周秦间低手人作”¹¹，此一观点得到阎若璩认同¹²，后世学者亦多从此说。今人陈梦家、屈万里等学者进一步指出《书序》形成于战国晚期¹³，其说大致不误。《史记》这三段采自《书序》的内容，其实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周初历史的认识。《周本纪》说周公“东伐淮夷，残奄”，将淮夷与奄视为并列的东土国族，下文又承此而言“成王既伐东夷”，显然是统括淮夷、奄两个国族。《鲁周公世家》记载三监叛乱称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也是将淮夷、徐戎并列为东土的两个国族。这与《春秋》、《左传》中以淮夷为东土特定的民族，东夷为东土族群泛称的情况完全一致。因为淮夷的强大，有时就单说淮夷以代东夷其他国族，如《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宁淮夷东土”即属此例。虽然淮夷在西周中期才与周为敌，但是周秦之际人们将淮夷视为东夷集团中的重要一员，淮夷出现的时代也因此与东夷为患的时间混淆不清。淮夷发展成为长期困扰周人的心腹之患，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周秦之际人们谈论周初东土叛乱的国族时，也以淮夷居首，或说淮夷、奄，或称淮夷、徐戎，淮夷都名列在前，省略言之就单称淮夷以代指其他夷人国族，淮夷成为了周初三监之乱东土国族的主角，其作乱的时间也被提前到周初。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不仅东土鲁南苏北有淮夷，淮河中上游也有淮夷，其时代在当时人看来又可以追溯到周初成王时期，与曾国始封时间恰好相同，其地理位置又与曾国相互邻近，因此曾侯與将“君庇淮夷”写进乃祖南公受命之辞就完全合乎当时人们的观念认识。此可视为真实历史湮没之后，人们受当时观念影响“层累造成古史”活动的一个典型范例。

附记：本文承蒙陈絜先生、赵庆森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谨志谢忱！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

〈1〉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五册，页1983，中华书局，1986年。

〈2〉 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翔欣点校：《尚书古文疏证》页555—55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陈梦家：《尚书通论》页285，中华书局，2005年；屈万里：《尚书集释·概说》页7，中西书局，2014年。